

草色遥看

上卷

【江雪作品集】

寂寞的低矮

守着清冷的月色

滋长成一片青葱的辽阔

所有纷乱的践踏

磨灭不了岁岁年年春梦的苏醒

马头琴弹拨着十指忧伤

如红柳拧结的藤条

倔强得不肯腐朽

穿越凄凄切切的长亭晚照

零落成红尘女子的

回眸一笑

裙袂飞扬处

草色隐约



江雪／著

黄河出版社

草色遥看

上卷

【江雪作品集】 江雪／著



黄河出版社

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

——兼答江雪等文友

赵瑜

一、提出一个问题

长治江雪等文友，原先做新闻工作。近日收到她寄来的报告文学集，伴有真诚来信。她和不少记者朋友一样，有写作才情，有追求信念，也很勤奋。但他们不约而同谈及一个困惑：新闻记者采写报告文学，具备媒体优势，原以为与这种写实文体算是“近亲”，几无隔阂，因而感到难度不大。但在写过几年又发表了一些报告文学之后，却发现读者反映一般，社会效果不强，各方面评价难尽人意。这时，感到真正写好报告文学并不容易，极欲提高一步。五月里，山东作协举办报告文学高研班，学员中有不少报社和电视台业务骨干，竟也纷纷提出了这一难题。我在济南与班上文友交流一课，发现此类问题超过一半。

从江雪来信中得知，她同样经历了曾经积极写作报告文学进而深深困惑这一过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了弯路？我由此想到一个老问题：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两种文体之间界线模糊，不易区别，往往将不少青年记者和学做报告文学的朋友带入误区。老问题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具有相当普遍性，值得我们探讨。

二、两者之间确有相似性

说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界线模糊，因而产生创作误区，是因为两者之间确有不少相似性。

过去，有些纪实文学选本，常常把报告文学和优秀通讯报道作品一起收进来，例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等。两种文体的最大相似点，就是非虚构写作。西方报告文学最早脱胎于报馆，因而评论界

概括报告文学特征,头一条就说她具有新闻性。确实,新闻作品与报告文学都不允许虚构和编造,都必须在真实人物与事实基础上完成写作。这种“天性”构成了一种相似的外表——都写了真人真事,完全不同于小说和戏剧。

新闻工作者与报告文学作家,其敬业本质也很相似:坚持科学理性精神,反对愚昧盲从。对真善美弘扬赞美,对假丑恶鞭挞批判,还要勇敢地揭示事实真相。美国《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进行不懈探究,以四个月时间采访了上千人,最终将真相公诸于世。民国时期,范长江行程万里,写出《中国的西北角》,此类行动,与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区别。

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家进行采访调查时,都将面对许多不可预见因素,工作方式几乎相同。深入探真探秘,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新华社记者杨明采写《足球黑哨》,我写《马家军调查》,开笔之前,都是如此,真相越是未知,越让人穷追不舍。优秀记者进入卧底状态,纪实作家亲临现场体验,行为一致。即便是写作历史题材,记者和作家也特别强调实地考察。缺失了以上环节,大家都会感到无法工作。这就与学者撰写理论文章大不一样。

你看,新闻写作和报告文学,与小说戏剧不同,与理论研究不同,自身之间却很相似。读者在阅读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时,心态也非常相似,人们都把这类文章当作真实可信的文本看待。这样的相似性,还能举出好几条来。正因为有着这么多相似性,所以推动江雪等记者们对于写作报告文学产生了动力,却也迷惑了不少年轻作者。

当然,还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相似性:由于时弊使然,当大批假新闻亮相惑众之际,亦有众多伪报告文学欺世刊行。

三、历史渊源不相同

既然两种文体具备了这么重要的相似性,为什么年轻作者仍然写不好报告文学呢?原因在于,大家忽略了两种文体之间,还有着更多不雷同不相似、甚至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兄弟俩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营生变了,老大种庄稼,打下粮食保人活命,老二种树林,培育木材供人建造。老大与老二的劳作功能都很重要,产品用途却大不相同。擅长收获口粮的记者,不一定能够种好树。

新闻记者与纪实作家,到底哪些地方不相同?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究竟哪些因素不一样?

首先,从历史上看就不像一回事。中国文字诞生三千年,一直没有催化出新闻专业,如果一定要拿纪实文体向上追溯,却可以追到文史公那里去。司马迁通

过采访写了《史记》，沈括根据调研写了《梦溪笔谈》，而表达孔子思想情感的《论语》，几乎就是与今天非常相似的“口述实录体”结晶。司马迁讲“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先祖文人们接受下来，终以优秀纪实散文构成中国正统文学主体。种种古代文艺作品也大多基于写实，唐诗的副标题或曰小序，都说真事儿，《西游记》里写玉皇大帝，还是照搬社会生活。戏剧多半取材于史实。而中国近代新闻业即现在常说的“新闻媒体”，同西医一样，都是清朝晚期才从西方传来，到民国年间得以大的发展。如此说来，如果报告文学写作照着古人学习，照着中国传统文化寻觅灵魂，可能还是一条正道，也是一条近道，照着西方新闻报道去学习，反而绕远了。因此，随着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新闻媒体日趋盛达，报告文学走向成熟，在报告文学界内基本上不再倡导作品的新闻性，而以“现实性”思考取代之。也就是说，写好报告文学，更需要加强文化准备而不仅仅是做好新闻准备。这一大差异，不知习惯了新闻写作的江雪等朋友们注意到没有？昨天，我到山西朔州一个叫吉庄的村子去，研讨作家郭万新所著《吉庄纪事》和《吉庄草根》两部报告文学，谈到《人民文学》发表的《梁庄在中国》，还有田秋平所著《田家英在长治》等作品，情况都是如此。思想文化准备结合社会学田野调查方法，影响着中国报告文学的深刻转变，其中的新闻性明显退位，一直退到报刊、电视和网络背后去了。

四、现实使命不相同

历史渊源不一样，现实使命也不相同。多数通讯报道的写作，动因来自记者单位的任务安排，至少须征得主管领导同意，完成作品后要经过程序化审核，最终在本报安排专版与读者见面。这就是说，写作通讯报道往往是新闻单位的职务行为。相反，报告文学作家多属个体劳动，最提倡特立独行自我体验，独立思考探索发现。作家背后少有单位支撑。即使是作家协会体制内专业作家，其创作也属于个体性质。写作相对自由而采访更加艰难。这使我想到了电视台专题片与独立制作人拍摄纪录片之间的差别，后者的成功极不容易，而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则高于专题片。

梁启超先生在近代新闻报刊崛起之初，大力提倡“时务文体”，首次提出“耳目喉舌论”，在当时引起巨大震荡。正因为这样，近百年来，报社或者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一出门就有了特定身份。记者代表着所属媒体，采访内容多以行政公务即业务、本事为主体，或表扬或批评，常常不由自主，还要保持政治倾向性。被采访者没有提供“海量信息”包括个人阅历的义务。记者尽管已经相当政治化，亦应保持中立客观立场表相，不可以将主观色彩、情趣好恶肆意铺排。这一准则

从采访开始一直贯穿到写作当中。新闻报道作为媒体单位的传声筒,也可以“断章取义”地报道一人一事一个侧面。而报告文学作家与采访对象打交道,并不具备特定媒体身份,不是老乡就是同学,不是来客就是朋友,不是学者就是同行,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总之他是一位个体探访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猎采访内容非常广泛,从行政公务到个人成长、思想履历,公私不分家,没有一定范围,谈得越深越好,嘻笑怒骂无妨。作家总是问了这个人,又问那个人,先探究一个侧面,又佐证另一侧面,反复置疑,多重多义。半个真相不满意,整体真实是追求。开写后既尊重客观事实,又表达主观倾向,作家主体意识至上,创作主题不一而足。简单说,通讯报道负载使命体现媒体意志,报告文学饱含个性书写作家情怀。这种差异,不知是否引起了江雪等年轻记者的充分注意?

五、采访办法不相同

前头说过,通讯报道和报告文学,作者通过采访得到第一手材料,然后动笔。这是相同的。但是,采访的具体办法和工作方法,两者却差别很大。在多数情况下,记者们好不容易抓住一位大忙人,彼此间颇不从容,有时候能搭上几句话也不错,因而常以问答方式突进采访。采访对象正在进行中的表面化行为、只言片语,处处重要,皆可入笔。二战时,一位记者堵住艾森豪威尔将军,挤上去只问了一句话:您对青年有何忠告?就算很满意了;对待各种事件,报刊总希望越奇异越好,倘若名人出点事,报刊积极性更高。大家常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一语中的。记者如果挖不出什么新鲜玩艺儿,便被认为功夫没有下够。普通人日常事,不入报刊法眼;通讯报道作为“放大的新闻”,先天需要弃旧迎新见异思迁,不停地适应新生活新任务,匆匆完成一档稿子,即被又一档新浪覆盖。记者调研写作某事,既不能慢慢去做专项研究,也不需要太深的专业水准,钻研过深时,读者反而看不轻松。新闻新闻,重在一个新字。正常情况下,记者对一篇通讯报道进行采访,往复次数不多,所耗时间亦短。好记者的素质正是迅捷、敏锐、干练、杂学;反观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前进行采访,除紧急情况外,恰恰不会满足于简单问答,也不乐意仅仅采访一次两次就匆匆动笔。作家们认为,采访名人和普通人同等重要,其价值取向差不多,对恒久不变的日常琐碎生活和奇异突变之事,作家均不轻视。解读奇异大事突变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视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更看重矛盾从积累到爆发的全过程,希冀着将事物的内在规律总结出来,交付读者。我写《革命百里洲》,生怕在当地驻扎时间太短。有时一住数月,先后往复了好几次。有的作家甚至长期钻在行业内部不出来。比如徐剑在二炮部队写导弹,李鸣生在国防科工委写原子弹,他们恐怕这辈

子也出不来了。他们宁愿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自身变成与作品同生共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报告文学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终生追念那个行业,热爱那片土地,直至被读者誉为专家大家。这一点与新闻从业者完全不同。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为了写好朱德生平,先于1937年上半年留驻延安,与朱德等领导人建立深厚友谊。而后,朱德前往血火硝烟的山西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紧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从陕北东渡黄河,随朱德及八路军总部转战雁北和太行山区,风餐露宿,驰骋沙场83天。她有时与朱德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谈,有时在一旁冷静观察朱德言行。她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谈,可以跟他交换情况,也可以闲扯一阵儿。”最终完成了《伟大的道路》这部杰作。你看,史沫特莱的采访,与新闻记者的采访大不相同。这时,报告文学作家已经近乎于一名专业同行,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不这样做,就不能诞生深入细致同时又动人心魄的报告文学。未知江雪等文友们,为了写好一部报告文学,是否有过长期沉浸其中深刻体验的类似做法呢?

一些记者文友会说,工作繁忙任务紧迫,客观上不允许我们深入到生活之中。这恰恰引发出一大现象:通讯报道往往舍弃了作者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譬如江雪,她熟悉长治县周边的城乡生活,那里是她生长的故乡,人物演变尽收眼底,大事小情俱在心中。写好报告文学包括各类文艺作品,基础正在于此,灵魂正在于此。无数作家从自己的故乡获得了笔底故事,几乎不需要去做问答题采访,只管从心灵深处写开去,人物事件层出不穷。不少年轻记者偏偏舍弃了这堆宝贝,不得不去匆匆采写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内容,弃熟而就生,弃深而就浅,这多么可惜?

由于记者和作家的采访办法不同,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大相径庭了。

六、立意构思不相同

前头说,通讯报道由于其政治性和任务性等因素,要求本次写作必须在短期内完成,或曰尽快完成。报告文学则有时较快,有时较慢,快些更好,慢也无妨。一些作品需要多年磨砺才能完成。有时写出作品当下很难发表,只好等待。我写完《太行山断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转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广东发表;《马家军调查》等了三年始发;2006年写完长卷《牺牲者》,眼下早已七年过去,仍不能问世。此类现象在报告文学业内屡见不鲜。真正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就应当明白:作品完成耗时较长,作品发表无从保障,没有报刊必须为你推出。不知江雪等文友们,你是知难而进呢,还是知难而退呢?请郑重抉择。

写作通讯报道,普遍偏短怕长,写作报告文学,普遍偏长怕短。记者擅长万字以内写作,构思总会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写不好短篇纪实,又是构思长篇习性泛滥的惩罚。重视这一差别的要求,在于提醒青年朋友们注意:两类文本的立意与结构大不相同,通讯报道不需要以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去谋篇布局,而优秀报告文学却必须运用文学艺术的立意和结构方法,努力追求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通讯报道旗帜鲜明,直奔主题,报告文学色调复杂,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题反而简单化了。以撰写体育题材为例:通讯报道为满足读者阅读饥渴,常常强调运动员特征特色,重视技战术分析,褒贬教练员业务能力,突出比赛结果;报告文学尽管一度也曾这样表现,但更重要的,是挖掘赛事背后的故事,追问体坛群体的精神世界,关注他们的人生命运,揭示读者百思不解的矛盾冲突,拓展全社会深层内涵,直至置疑金牌体制,升华人性主题。我写过几部有争议的体育类作品,都是一个指导思想:书写体坛却要超越体坛,重在体育比赛之外的悲喜剧。引发争议促进读者思考正是好事,只要对大局有利,或对或错都不要紧。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报告文学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正因为如此,通讯报道最终归入了新闻范畴,而报告文学最终归入了文艺范畴。我们常常见到一些所谓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内容相当丰厚。仔细读过始知,作者和盘托出了一堆芜杂素材,甚至是一堆难得的珍贵素材,却忽略了文学艺术“以人为本”的凝练提纯之立意,轻弃了主题思想的开掘提升。最近一部反映长治工厂导致漳河污染的报告文学,效果正是这样,报告了一篮子蔬菜原料,还不是成品佳肴。

通讯报道以“放大的新闻”立意构思,写好一档大新闻,有意义有难度,颇不容易;而报告文学不要“放大的新闻”,只要“文学的报告”。那么,报告文学除了“非虚构”这一特征不可违背,其余各方面理应按照文艺作品的标准去做,与做小说写剧本以及炮制各种文艺作品没有区别。从江雪等文友已经发表的本看,大家很可能忽略了艺术性结构,忽略了线索、伏笔、悬念,忽略了人物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发的人生命运,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联系,忽略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语言。一句话,尚未重视文学艺术的力量。

七、语言运用的不相同

大家知道,摄影是光影的艺术,美术是色彩的艺术,影视是视听的艺术,文学作品则是语言的艺术。没有作家对语言的掌控运用,文学作品根本无从诞生。文学作品好不好,头一条要说语言好不好。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对话,全靠

作家呈现语言之功。

作家运用个性化语言,记者运用共性化语言;作家运用民众化语言,记者运用公权化语言;作家运用文艺化语言,记者运用新闻化语言;作家运用陌生化语言,记者运用通常化语言。

通讯报道的通常化语言是个什么样子?评论家阎纲先生把此类语言概括为“新华体”,十分精到。也就是说,作家要警惕乃至拒绝新华社发布通稿般的标准化语言,运用个性语言改善文艺作品的面貌,回归文学本身。《史记》和《论语》包括《梦溪笔谈》都不是奏折,报告文学也最怕写成公报,核心问题还是语言。而写作通讯报道并不存在这一问题,既可以运用通常化的“新华体”,也可以运用公共语言。既然通讯报道是媒体意志的集中体现,那么,署了个人姓名也是职务行为,并非记者独有的声音,哪能由着性情书写,或肆意放歌或浅唱低吟呢?

作家写作报告文学,避免公共语言,运用自家语言,与通讯报道适得其反。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句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记者熟练运用无妨。作家却不宜这样说话,是否可以这样写:“那年,你上县里开会回来,咱村就分了地”,同样表述了“三中全会以后”这层意思且丰富许多。

江雪等文友的报告文学当中,习惯性地运用了不少“新华体”语言,其体貌特征也就和通讯报道十分相近。时间一长,积重难返,问题就多了。作家学习语言,不是一朝一夕的小事,而是一辈子的大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好的文艺作品,也就没有优秀报告文学。首先要说作家自己心中的话,而不要“新华体”。

八、最后谈谈褒贬问题

原想答江雪等文友一篇短文,未料写来颇长。通讯报道与报告文学相似而不相同,还能总结几点,但主要差异似乎已经说清。

顺便回答一个问题。江雪来信说苦恼,认为基层写作深受环境制约,难以展开对周边人事的反思与批评,因而局限着作者的思考力度,影响着作品的批判品格,担忧报告文学这条路能否走得长久。这当然是一个普遍难题。我想说的是:如果单指批判写作而言,作者生活在真切环境里,必定有所顾忌,放手写作确有难度。但是,更重要的追问在于,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讨论批判写作?大家可能又一次沿袭了通讯报道倾向单一、旗帜鲜明的思维方式;还有人从直觉上认为,通讯报道多是褒,报告文学多是贬,不褒扬就发不成通讯报道,不贬批也写不好报告文学。这就陷了入一个误区。人们常说西方知识分子突显批判意识,我们需要学习效仿。其实,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而更实质精当的说法,应该

说优秀知识分子坚守了自身独立意识。他们独立思考,独立言论,独立写作,独立主宰命运,全靠自己,不靠神仙皇帝。而宝贵的独立精神当中,既包含了贬批,也包含了褒扬,有时,两者混杂相处于同一部著作中。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便是这样:陈景润一心敬业,感人至深,而长期以来不尊重人才、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则必须揭批。你看,假设作品对事物进行单一批判或歌颂,反而浅薄空洞,减弱了力量,既不会在现实阅读中产生轰动,也无法在经典文本中持之长久。“文革”以后,大批作品愤怒揭批“四人帮”,这与前一时段揭批“走资派”的创作取向没有质的改变,两种作品只是斗争对象的转换,都是时势所造,都不曾彰显作家的独立思考以及科学理性精神,于是两种单一批判作品合二为一同归于尽,命运都极短暂。

在一些年轻文友看来,自己最熟悉的区域生活十分庸常,不值一谈。即使发现坏人坏事,还牵连着更多的一圈人,不便深入贬批。这时候怎么办?我以为一方面还要写下去,总不能等到大环境既民主又宽松的时候才动笔;另一方面更需要读书不止,从容思考,不必过急。多听多看多感受,磨刀不误砍柴功。那么,要等到甚时候才是一站呢?说透了,要等到你觉得庸常生活不庸常,区域生活很精彩的时候才好。所谓文思泉涌下笔有神,也是这时候才会出现的。作家看待生活,最怕非黑即白,人物与事件、历史与现实,都是色彩斑驳搅在一起的。辽金时期,长治县八义窑烧出一种“红绿彩”瓷器,又烧出一种“搅釉”瓷器,都是开创性的珍贵品种,为今日藏家所稀求;生活中同样呈现出这种情况。如抗战之初,一个村走出一批义勇青年,无意当中,半数参加了八路军,半数参加了晋绥军,都在浴血抗日。结果,人到中年,这批人的命运发生了天地之变,后者干脆成了“历史反革命”。执政者这样去裁决了,作家也要这样裁决吗?不久前在江西开会,一位作者向我谈起,他正在寻找当年红军亲属以及女红军幸存者,说她们用生命和血泪锻造了一段光辉历史,自己却尚未写出感人神韵,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红军亲属被残杀,当然令人悲痛,可是,白军亲属亦被残杀,又当如何?作家该不该看到暴力革命对同胞的整体摧残?文学艺术讲不讲人性呢?

扯远了,回我们本土来。我时常收到《长治史志》和《红色太行》等文史报刊,办得很好,每期必读。而近日我还是忍不住给办刊的杨宏伟和田秋平两先生写了信去,希望刊物不仅要反映共产党建立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文史内容,也要反映当年国民政府指挥九个军的将士,与八路军并肩抗日的史实,这是国共两党最好的一段合作期,上党人民用勤劳种植的小米,养育了多少中国军队?直至最终获得抗战全胜。这样办刊,价值意义就能拓到更宽。朋友们表示正打算这样去做。作家看待本土生活,也应该有这种独立考量,不是无事可写,而是书写不尽,

不要单一褒贬，而要科学理性。

昨天，平顺县委李玉忠先生来，商议在川底村建造农业合作化历史展馆一事，那里也是赵树理先生写出《三里湾》的地方。玉忠先生谈及一个观点：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是从长治乡村开始的一段特殊历史，我们把珍贵史实整合起来，供后人总结历史、研究得失所用，而不做或褒或贬的附庸。我很赞赏他的意见，珍惜上党农民走过的道路，并不看重简单褒贬。尊重历史真相，坚守科学立场，值得陷入报告文学写作困境中的人们借鉴。

希望江雪和久在新闻媒体工作的友人，扬长避短，再著新篇。从记者出身成为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到底要比别人容易许多，先例有往日的刘宾雁后来的卢跃刚，一批接一批，竟难以计数了。最近，老牌体育记者张健先生，又写出了北大荒精彩纪事，妙不可言。真诚祝愿江雪新书出版，竿头益进。中国报告文学队伍有些老化，需要大批年轻人加盟。

话说多易错，就此打住。

2013年6月于山西作协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申纪兰进京	1
担 当	
——走近山西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杨雷平	10
他从西口来	
——记八一百货大楼董事长宿建民	27
大爱无声	
——走近长治九中校长李士宏	52
坚 守	
——走近《潞安矿报》社社长魏夏芒	70
风景这边独好	
——走进晋峰生态园	82
托起一片艳阳天	
——走近云峰医院院长徐云峰	88
蓝领奇才周建民	107
郭秋林：画纸情深	124
生命卫士刘桂芝	139
一位农民的中国梦	
——走近平顺农民王青山	146
庾李平：行走的思想者	158
山村好人	
——记壶关县百尺镇大南山村村民杨兵则	168
放羊娃的蝶变人生	172

用青春守望真情

——记《守望真情》栏目主播秦晓红 177

“苹果妹”宋明凤的艺术人生 181

李彩虹：甘做护花春泥 185

穷妈妈 富妈妈

——爱心女士卢玥如的大爱人生 191

殷秀珍:22 年的扫帚情缘 197

用生命歌唱

——走近襄垣县盲人曲艺队 202

“玻璃”兄弟的泥塑梦 210

一位女中学生的救母之路 215

蓝天下的伟业

——山西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十周年巡礼219

走进美丽郊区..... 233

太行高度

——回望长治市城区“十年磨一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之路 251

根基

——平顺县干部下乡驻村纪实 266

破茧蝶舞

——长子县构筑和谐社会推进转型跨越式发展纪实 283

后 记 314

申纪兰进京



平顺县县委书记吴小华为申纪兰送行

2013年1月30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出70名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84岁的申纪兰再次当选，成为唯一一位连续十二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中国选民。

3月1日下午，平顺县委举行申纪兰赴京送行会。乍暖还寒的春日，申纪兰感冒了。午饭后，她吃了两粒感冒胶囊，开始收拾行李。60年了，她也记不清自己去北京多少次了。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出差。往日出生门，她

通常不带什么行李，但这次不同，她带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是县委亲自安排给她做的，她想把这件衣服穿到大会上去。

欢送会上，平顺县领导吴小华、秦军、苏和平、赵小平、张宏方等与申纪兰一一握别。平顺县县委书记吴小华紧紧握着申纪兰的手说：“申主任，您是咱平顺人民的骄傲，是上党老区人民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到了北京，您要保重身体，注意劳逸结合。还有就是把咱老区人民的所思所想带到会上，把中央的精神领会好、带回来。”

申纪兰说：“吴书记，你就放心吧。我会认真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利、履行好代表职责，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带到会上去，开好这次大会。”

申纪兰踏上了北行之路，踏上了她行走了60年的北京之行！

第一次出山

1929年12月，申纪兰出生在平顺县龙溪镇杨威村。1946年，17岁的申纪

兰嫁到了西沟村。

申纪兰巾帼不让须眉，带领西沟村妇女下地参加生产劳动，掏粪、放羊、扶犁、播种，样样拿得起，成为了新中国新式农民的代表。这一年，她还大胆提出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要求，并通过劳动竞赛得到了西沟男人们的认同。

1952年12月10日，李顺达带领西沟村26户农民成立了农林牧初级生产合作社。经过选举，申纪兰由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为了西沟历史上也是平顺和山西唯一的一位女副社长。

那年12月，晋东南地委召开座谈会，总结交流初级社的经验。而年初确定的10个初级社里，没有西沟。到会人员除了10个合作社的正副社长、所在县的书记、县长以及地委下属农口的领导外，就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了。

看着济济一堂清一色的男同志（除《人民日报》女记者蓝邨外），当时的地委副书记赵军说：“咱10个合作社怎么连个女社长都没有？”

赵军也许没想到，他的这一问竟然会问出一个风雨60年、与共和国共成长的“国会议员”来。

赵书记这样的开场白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意外，一时间会场上鸦雀无声。就在赵书记失望之时，平顺县县委副书记李琳说：“我们平顺倒是有一个，西沟合作社副社长申纪兰。但她不属于这10个老社，是10月份刚刚才当选的新社长。”

“咱们既然开的是座谈会，就不要有那么多的死规矩，多一个社长参加也没什么不行，赶快打电话叫申纪兰来参加会议！”

那时交通不便，会议通知传到西沟，已是下午。刚刚当选10多天的申纪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副社长还能到地区开会，而以往开会都是李顺达去参加的。

她赶紧找到李顺达，征求意见。

李顺达说：“让你去，你就去，去了找李书记。他让你说甚你就说甚，不要怕。”

李顺达本来是要雇骡子送申纪兰的，但需要花5块钱，而且按照那时的规定，只有县委书记才能骑骡子，所以申纪兰坚决反对。刚巧合作社副社长马玉兴在旁边，就说：“那就骑我的驴去吧，我的驴也不用花钱！”

“骑驴就骑驴！”申纪兰爽快答应了。拍拍身上的灰尘，从炕头上抓起一条白手巾扎在头上，申纪兰急急忙忙走出了家门。

马玉兴早已把毛驴牵到了沙底栈。申纪兰走出屋门，将一条小棉褥搭在毛驴背上，翻身骑了上去。马玉兴牵着驴，申纪兰骑在驴背上，两个人走出了村子。

能去潞安府，马玉兴高兴地哼起了上党梆子。

申纪兰的心里，一样是兴奋的。这是申纪兰第一次走出大山。她想起了与丈夫张海良告别的那个夜晚。申纪兰说：“等全国解放了，你一定领我去潞安府一趟，听说潞安府有个莲花池，那里可美了。”

张海良说：“是很美。那里还是山西牺盟会办公的地方。我在长治休整时在那里休息过。等和平了一定带你去看看。”本来是希望丈夫回来后带她到长治转转的，没想到这个夙愿没等丈夫回来就要实现了！

那时候，从平顺到长治不要说公路，就是一条像样的土路都没有，全是羊肠小道。碰到崎岖难行的地方，申纪兰就得下了毛驴，与马玉兴一起步行。

7个小时后，申纪兰到达了长治地委。平顺县委副书记李琳在外面正焦急地等着她。

“李书记，我讲不了话。这不是去种地，出力气就行。这么多生人，我怕丢西沟人的脸！”申纪兰一见李琳连忙“诉苦”。

“你不要怕，你这样想，会场上的人都是西沟的老百姓，你就当是给西沟人讲话哩！”

“那我说什么？”

“你就讲如何发动妇女下地劳动，参加劳动竞赛就行，讲得越详细越好。”

这天晚上，申纪兰住到了地区招待所。进门后，只见服务员在门口拉了一下，屋子里立刻亮堂起来——比点了10个煤油灯都亮！申纪兰明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电灯。那时候，不要说西沟，就是平顺县城，也还没有电灯。申纪兰想，什么时候西沟也能有电灯就好了，姐妹们晚上做针线活就不用太费眼了！

第二天，申纪兰当着许多陌生面孔开始了她平生第一次会议讲话。申纪兰的魄力和勇气让赵军始料未及。会议结束，赵军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对于申纪兰来说，她的收获不仅仅是平生第一次走出了平顺的大山，来到了潞安府，在会上，她还遇到了一位让她走向世界舞台的新闻记者——蓝邨。

蓝邨敏锐地意识到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重大社会意义，1953年1月25日，她以《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为题，在《人民日报》对申纪兰带领妇女下地参加劳动，特别是敢于为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权利的经过做了详实的报道。之后，男女同工同酬被写进了新中国的《劳动法》。

申纪兰的名字，很快从偏僻的小山沟，传到了全国各地。

第一次赴京

1952年年底，申纪兰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出席了在省城太原召开的工农业劳动模范大会。1953年春天，申纪兰被山西省妇联选为全国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

听到这个消息，申纪兰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到北京去，出那么远的门，她有些害怕；但想到能见到毛主席，她又非常激动。

她对来传达消息的李顺达说：“顺达哥，你能不能跟领导说说，我别去了，你替我去。”

李顺达一愣：“纪兰啊，这事轮到别人高兴都来不及呢，你怎么还推脱？更何况，这是妇女代表大会，我一个大男人，怎么替你？”

李顺达接着说：“我听说，咱山西的20多名代表中，就你一个人是农民。你代表的可不单单是咱西沟和晋东南，而是代表山西省的农村妇女！不要再推辞了，赶紧准备吧！”

4月的平顺天气还不暖和。北京是大城市，该穿什么好呢？申纪兰犯愁了。

那时农村没有毛衣，更没有羊毛衫。老百姓一年四季“老虎下山一张皮”，申纪兰身上穿的是春节刚缝好的自家手工织的蓝色条条粗布棉袄。再扯布缝一件新衣服吧，申纪兰舍不得。想来想去，申纪兰有了一个主意：她脱下身上的棉袄，拿了剪刀和针线，很快拆了起来。缝头拆开后，她将棉袄内的棉花掏出来，又将缝头用针线缝好。棉袄改夹袄，这样看起来就不那么笨了。

4月10日，申纪兰出发了。这一次，她听从社里安排，骑着骡子到长治。

山路，还是那条山路；但那一天的申纪兰，已经不再是第一次出门到长治的申纪兰了。沿着蜿蜒的羊肠小道，先到长治；在长治，她换乘了一辆敞篷大卡车，到太谷；在太谷，她又换乘上了一辆小火车。两天后，她来到了太原。

虽然来时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群代表中，申纪兰土气的粗布蓝色掩襟布衫、宽腰大裆裤和绑腿还是格外扎眼。时任山西省妇联主任黎颖觉得，申纪兰代表着山西农民形象，她的装束不太合适，于是找了自己一件最宽大的外套，让申纪兰换上。

夜幕来临时，代表们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那是申纪兰第一次见到大火车并乘坐大火车。她摸摸这儿，看看那儿。这样长的“汽车”，能拉多少人啊！

到达北京已是天亮。下了火车，西沟人向往的皇城北京豁然出现在眼前。这一刻，申纪兰才真正见识了什么是大城市！最主要的，大救星毛主席就住在北京的中南海。申纪兰激动起来，如果能见上一面毛主席，死都值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还非常落后，大多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到北京后，代表们每天的伙食不是面条就是大米。“那是我第一次吃大米，感觉真比过年还好！”直到今天，申纪兰还是非常感慨。

4月15日上午9时，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怀仁堂正式开幕。会上，许广平致开幕词，申纪兰排在第二个发言。

发言稿是山西省妇联起草拟定的，内容依旧是申纪兰带领西沟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事情经过。申纪兰早在驻地就给山西的代表们练习读了好几遍，所